

# 澳華新文苑

第1229期(A)

## 致澳洲 映霞

在悉尼的棕櫚海灘的至高点，在聆聽德沃夏克，聆聽海浪，聆聽歲月，聆聽自己中寫下了此詩：

它被稱作最小的大陸——  
却遼闊得讓海洋都沉默  
遼闊得讓太平洋把整片鹹澀的歎息  
折進一隻被遺棄的貝殼

它像一塊漂浮的巨石——  
却承載著地球的夢與心跳  
這裡沒有喧囂——  
只有寂靜鋪展到無邊  
只有浪花輕輕拍打時間

它漂流，它漂移——  
它把一整塊孤獨  
磨成一面倒映的鏡子——  
它與自己的影子對飲  
它把新大陸——  
翻譯成一首沒有主語的長詩

於是，我把手輕輕地伸進

這一傾而下的藍色——  
像伸進一隻倒空的酒杯——  
我觸摸到大陸的邊緣  
我觸摸到歷史結痂的懸崖  
我觸摸到人類心臟善意的節拍

我又把耳朵慢慢貼上  
時間起伏的回聲——  
我聽見波濤把鹽粒吹進詞彙的縫隙  
它用海水泡軟的語氣——  
溫柔地對我說：

“來吧，親愛的映霞，  
用你胸口那塊帶血的熱愛  
讓我們合寫一首詩——  
一首只有兩行的長詩：  
一行是：我漂泊，故我在。  
另一行是：我遼闊，故我容四海、八荒。”

## 錢秀玲——比利時的國家英雄

在比利時的艾克興市，有一條“錢秀玲路”，二戰期間，錢秀玲從納粹的槍口下，先後挽救了一百多位人質的性命，比利時政府為此將國家的最高榮譽——“國家英雄”勳章，授予了她。

2022年11月，借出遊歐洲的機會，我和太太順道前往布魯塞爾，探尋這位遠方親戚的生命軌跡。

時間撥回到1944年6月，在被德軍佔領的比利時艾克興市，3名德國軍人被當地抵抗組織擊斃。德軍當即圍捕了九十六名市民，並發出公告：如果抓不到相關的抵抗組織人員，就逐批槍斃所有的人質。在這性命攸關時刻，遊擊隊員連夜驅行一百多公里找到了錢秀玲。懷著五個月身孕的錢秀玲沒有絲毫猶豫，毅然前往德軍駐比司令部，找到駐軍最高統帥、錢秀玲堂哥錢卓倫的摯友法肯豪森上將，成功挽救了九十六位無辜的生命。

在這之前，錢秀玲已經挽救了幾位抵抗組織成員，當地居民因此稱她為“大救星”。

錢秀玲1913年出生於江蘇宜興，自小聰慧、學業優異，1929年赴比利時魯汶大學，獲取物理、化學雙博士學位。她的理想是成為像居里夫人那樣的科學家。不期而至的戰爭打碎了她的科學夢，在兇險的戰爭環境下，錢秀玲展現出她的另一面：見義勇

為的人道主義精神。錢氏一族家學淵源，人文薈萃，錢家堅持耿直善良、寬厚堅強的儒家傳統，是典型的耕讀世家。

這些特質在錢秀玲的爺爺、父親、堂兄錢伯倫和錢秀玲身上都有充分的體現。

錢秀玲的爺爺錢生詳是位貢生，為鄉村修路建橋而不圖名利。

父親錢熙勳是當地知名鄉紳，熱心辦學，多有善舉，視名節如生命。

堂哥錢卓倫，官至中將，書法遒勁超逸，曾是宋美齡的書法老師。他在南京保衛戰中，頂著壓力，安排輪船將二十萬被困百姓渡江轉移。

錢秀玲在危難面前展示出的勇氣和智慧，與她的家族傳承是分不開的。

戰後，法肯豪森被押回比利時，人們群情激憤，要判這位高級戰犯死刑。這時錢秀玲頂著巨大的輿論壓力，為這位正直的將軍作證，挽救了他的性命（法肯豪森曾因反對希特勒而遭納粹逮捕）。

我太太在宜興長大，她的外婆姓吳（錢秀玲的娃娃親也是吳家），而外婆的媽媽和錢秀玲的爸爸是親兄妹。1979年錢秀玲回鄉探親時，還送給外婆一個精緻的手提包，那次我太太見到了錢秀玲，印象中她衣著時尚、臉上總是掛著和藹的微笑，是一位非常親和的長者。



錢秀玲遺照

我們到布魯塞爾後，嘗試著打電話給中國大使館說明來意，經同是宋美齡的書法老師。他在南京保衛戰中，頂著壓力，安排輪船將二十萬被困百姓渡江轉移。

有了錢大哥的引導，我們順利找到錢秀玲的墓地以及她曾經經營過的餐廳舊址等，並有幸聽到了不少錢秀玲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錢秀玲本人對自己做出的巨大善舉並不在意，她從不主動提及當年的義舉，她認為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情：“這就像看到一個孩子跌倒在地上哭喊，每個人都會上前說明扶起來一樣”。

錢秀玲的善良、寬厚、正直、勇敢，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懷念。我們應該像她那樣，看到他人遇到困難時伸出援手。雖然我們不能像她那樣挽救生命、捐建中文學校，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展示人道主義精神。

劉蓬

## 父親

2006年5月的一個清晨，我接到了母親的電話。電話那頭聲音急促：“你爸爸今天早上在公園摔倒了，現在還昏迷不醒，已經送進醫院，你儘快回來吧。”

我放下電話，腦中一陣嗡嗡響。迅速安排好公司的事務，我直奔悉尼的中國領事館。簽證視窗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如果加急辦理，第二天一早就能拿到簽證。我已經查好了航班，明天中午11點，有一趟直飛上海的飛機。工作人員說：“你明天早點來，開門第一個取簽證，肯定趕得上。”

第二天下午，飛機一落地，我便直奔醫院。父親躺在重症監護室裡，身上插滿了管子，喉嚨處開了氣管切口，連著呼吸機，只有眼睛是睜著的。

我輕輕握住父親的手，低聲說：“你看著我，知道我是誰，就握一下。”

那只瘦弱乾癟的手，微微動了一下。那一刻，我知道，父親聽見了，看見了，也記得我是誰。

在我童年記憶裡，父親是嚴厲而不苟言笑的。

吃飯時，父親坐在主位，孩子們都得規規矩矩：不能發出聲響，碗必須端起來，身子不能趴在桌子上。他的嚴格，有時甚至近乎苛刻。

我小學時，在老師眼中是個乖學生，還是班幹部。常常放學晚歸，父親總是板著臉，說我就是藉口多，不想回家。父親當時也在小學教書，為什麼如此在意我放學晚歸？我一直不明白。

在家中，父親最寵愛的是妹妹，最操心的是弟弟。

中學畢業那年，父親把我叫到身邊，語重心長地說：“良良，你快分配了。我想了又想，你還是去農村吧。這樣，等你妹妹畢業時，她就能留在城裡。你是男孩，出去闖一闖不怕，可你妹是女孩子，我不放心她去。”

那時，分配有“硬檔”和“軟檔”之分。我屬於“軟檔”，若爭取一下，是有可能留在上海的。可我沒有猶豫，當即答應了父親的要求。

1976年4月的一天，我登上了前往崇明長征農場的輪船。臨行前我和父母說好，誰也不要來送行。但我知道，父親那天一定心神不寧，因為是他親手把兒子送到了農場。

1979年我準備參加高考，利用農場假期回上海複習。父親為我買了複習資料，還聯繫了補習學校。但不到三周，農場來電催我回去。我心裡不甘，父親卻平靜地說：“你還是回去吧，也許大學這條路，真的不屬於你。”

可沒人料到，我竟然考上了。

父親後來告訴我，親戚朋友都不看好我能考上。

當大學錄取通知書寄到農場，我第一時間打電話給父親。電話那頭的父親淡淡地說：“我明天去買船票，帶你弟弟一起去農場看看。”他是想親眼看看兒子曾生活

過的地方。

1989年，我再一次離開家鄉，這次更遠，去了澳大利亞。

那天，父親同樣沒來送行。他知道，他的大兒子，已經可以獨自遠行。

1995年，父親第一次來澳洲探親。白天我要上班，父親整天獨自在家，坐在沙發上抽煙。他很節儉，看到水龍頭滴水、燈沒關，都會悄悄去處理。但對他而言，煙是斷然不能戒的。

三個月下來，他坐不住了，嚷嚷著要出去打工。結果真的找到活幹，一年後還帶回去七八千澳元。

1998年，父親第二次來澳洲。那時我已開著大卡車全州跑，父親閒不住，每天坐在副駕和我聊天。我發現，父親變了，話特別多，仿佛要把一輩子沒說完的話全補回來。

可無論如何，他仍是那個固執、爭強好勝的父親。

一次在加油站，我的卡車與一輛小車擦碰，對方跳下車嚷嚷，說自己的車是名牌，很貴的。父親立馬回敬：“你這車算什麼名牌？我們這可是賓士！”

我一看，父親說得沒錯——我開的卡車，的確是賓士。於是安撫他說：“爸別急，有保險，什麼車都一樣的。”那位“名牌”車主聽了也安靜下來，大家互換資訊，客氣道別。

父親是個倔強又護短的人。在上海時，他常對電視節目發牢騷，哪都看不順眼。但到了澳洲，他卻容不得別人說中國半句不好。

有一次，他在餐館打工，一位香港人問他：“你們大陸也有電視機嗎？”父親一聽火了：“我們家有電視機的時候，你可能連電視是什麼樣都沒見過呢！”

父親很聰明，動手能力也強。敲個煤油爐子、修個鬧鐘、打個傢俱，樣樣精通。我最佩服他的一項手藝，是電工。他沒正式學過，卻能用電子示波管組裝出五寸黑白電視，在國產九寸電視問世前，我們家裡就有電視機了。

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我從小就愛鼓搗電子產品，也成了裝半導體收音機的小能手。

其實，我和父親，骨子裡很像。對不熟的人少言寡語，一旦爭執起來，卻也是不依不饒。動手能力強，嘴硬心軟。畢竟，我是唐家的大兒子。

那段日子，是我記憶中最溫暖的一段時光。父親像變了一個人，而我自己也在重新認識這個曾讓我誤解多年的男人。我甚至試圖從父親的語氣、動作、甚至沉默中，找回曾經那些錯過的父子情感。

可是時間太短。父親每次在澳洲待一年就回國了，說還是喜歡住在老地方，說不習慣這邊的生活節奏，太慢，又不懂英語。

現在，我站在這裡，在這片樹影婆娑的墓地前，對著父親低聲說：“爸爸，我來看您了。”

風拂過樹梢，吹皺了落葉，也吹痛了我的心。我仿佛聽見父親的腳步聲，在身後響起，又慢慢隱去。

我們在墓前站了許久。母親一言不發，只是不時抬手擦眼角。她的背有些佝僂了，歲月像風一樣，一點點地吹彎了她的脊樑。妹妹站在一旁，雙手交疊放在身前，神情安靜而哀傷。她是那個幸運的孩子，沒有被時代推下鄉村，卻也在父親那座沉默山峰的影子下長大。

我輕輕插好香，擺上三碟簡單的供品，又在墓碑前倒了一杯白酒。我跪了下來，額頭貼近地面，仿佛要將那些未曾說出口的話，都傾進這片冰涼的泥土。

“爸爸，我想過很多次，要是我能早點懂事，或許我們之間不會錯過那麼多話。”

“其實，您是個好父親，只是……我們太晚才學會彼此靠近。”

“但我想讓您知道，我一直記著，記得您臨走前我們在悉尼最後一次散步，您說——‘你現在做得不錯，挺像我年輕的時候。’”

我再一次磕頭。墓碑上的照片泛著淡淡光暈，父親依舊是那個眉頭緊鎖、不苟言笑的模樣。可我知道，照片之外的那個男人，也曾有過少年心氣，也曾愛過、痛過、掙扎過，只是無聲地藏在歲月深處。

祭掃完畢，三人默默地走下山坡。母親走得有些慢，我在旁邊扶了一把。車在不遠處的山腳下，周圍都是沉靜的松樹林。

坐上車，妹妹才輕輕開口：“哥，其實爸爸心裡最掛念的是你。”

“嗯？”我轉頭。

“你走後那幾年，他經常跟我和媽念叨，說‘不知道良良在國外習不習慣、吃得慣不？’，還說‘這孩子嘴硬，心軟。’你以為他不關心你，其實——”

她沒再往下說，只是低頭抹了抹眼角。母親坐在副駕，一句話也沒有，只是緊緊捏著手裡的毛呢手袋，那是父親用過多年的舊物。

車窗外是回春的田野，青草剛露頭，幾隻烏鴉從電線上飛起。空氣中還有些寒意，但陽光正好，像是在某個無聲的地方，點亮了一盞遲到的燈。

那天回去後，我在父親老屋的書桌上，發現一本發黃的筆記本。翻開來，第一頁寫著幾句話，用工整卻略顯生硬的字跡：

“良良長大了，去了很遠的地方。希望他好，好過我們。”

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淚。我終於明白，有些愛，是無聲的，有些話，是一輩子都說不出口的。而有些告別，是一生中最沉重也最輕盈的——因為它不再帶著怨恨，只有理解。

那天夜裡，我在父親書房的籐椅上坐了很久，直到東方泛起微光。我仿佛聽見父親在屋外喊我：“良良，別晚回家，早點回來。”

唐培良